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理论

当工业文明已经在世界某些国家成长之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随之被提上日程。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方工业化运动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尝试对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进行研究和总结。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关注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问题，对亚洲工业化也着墨不少。马克思主义注意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变迁中的基础作用”^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大工业给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变迁，因此非常注重在工业基础薄弱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加快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以尽快实现工业文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阐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②。当然，马克思在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侧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层面进行探索。^③

① 张建云：《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学理论》2009年第5期，第30—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③ 肖建忠：《全球视野发展观的由来——马克思主义及以后的发展》，《当代财经》2002年第4期，第7—11页。

一 关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主要思想

(一) 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前提

民族独立是落后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①他们认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②“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③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④。马克思主义上述论述揭示了落后国家现代化的首要历史前提，即民族独立。

(二) 工业化发展的非同步性

工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国家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在同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业化在18世纪下半叶发生于英国，后来相继发生于世界各文明国家。在不同的国家，工业化进程也是不同步的。1884年，恩格斯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在英法等向大工业的过渡大体完成的国家，社会处于稳定状态；而德国还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发生着类似英法曾经发生过的工业革命。

马克思也的确根据他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分析，做过社会主义革命会先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后陆续胜利的估计。甚至他还说：“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是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⑥在一个具有普遍联系和交往的开放性世界体系中，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提升，必然会对其他后发国家产生相应的影响。“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60—2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3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6页。

此外，不一定要非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①

“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就人类文明总的历史进程而言，人类文明总趋势是向前的，这是一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社会发展看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③。

（三）社会主义是否可以在落后国家建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定的历史跳跃现象，也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世界历史早已表明，虽然“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④，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那些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超越完备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必须具备超越的历史前提，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并且已经造成了发达的社会化生产力。与此相关联的国内必要条件则是资本主义（包括私人资本、国家或官僚资本以及外国资本）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和一个经过锻炼的、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而且当这些经济技术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其先锋队的率领下，由于有利的形势取得了政权之后，还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来的积极成果，以促进本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作为建立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物质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以及无产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纲领，并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⑤，但是应把资产阶级革命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接着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及同期的其他著作中，又陆续地提出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民族解放问题、人民军队和国家形式等重大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无产阶级不断革命完成资产阶级放弃的未竟的革命任务，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页。

革命。

对于上述重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分别做过论述。他们认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①因此，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领导权，才能“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②，才能将革命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推进。

不过，马克思说，俄国“农业公社”“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③。在反驳否定跨越的可能性的观点时又进一步指出：“可以问他们，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也可以问他们，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④而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制度能否实现跨越，最终还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占有发达国家的文明成果，是否具有新制度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他们认为“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⑤。处在19世纪末的俄国等非西方相对落后的国家，之所以要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在马克思看来就在于其“特有的历史条件”，即“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⑥，所以，“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⑦。

（四）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路径

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最基本的认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文明有着相同的发展路径，也因此，随着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建立，不同国家大体上最终建立了类似的工业水平。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对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统一市场的建立引起了两个结果：一是把世界各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间的事变是相互影响的；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② 同上书，第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

④ 同上书，第4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3页。

⑥ 同上书，第501页。

⑦ 同上书，第510页。

是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大致相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为社会上两个基本阶级。“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① 这里所谓的“文明国家”指的是英、法、德、美等国家。

马克思认为：这是由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定的，它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②，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革命，它首先在欧洲资本主义最发达、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爆发，然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再帮助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落后国来说，可以先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然后在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社会主义。

关于如何向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认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国有合作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所有制。恩格斯说，工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落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③。为此，他们提出了国有合作经济形式，其特点是国家把全民所有制的工厂、企业或土地等生产资料租给或交给劳动者合作团体独立经营。它从总体上和根本性质上看，是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复合，可称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16页。

复合公有制经济。

(五) 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

最初恩格斯认为俄罗斯以公社作为嫁接现代大工业基础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空想。这是由于农村公社本身是一种自发的、狭隘的组织形式，既不存在能够容纳依靠许多人的共同协作而形成的现代大工业的可能机制，也不存在组织和管理大工业的功能，另外，长期囿于公社狭小天地的俄国农民，根本没有接触因而也不了解现代大工业，更不懂得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因此，俄国农民不可能成为完成嫁接的社会主体。

当俄国社会中的公社制度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产生了一种研究东方社会的紧迫感。他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道：“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材料。”^①

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内部结构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更加确信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发展道路。他对以往有关东方社会道路的观点做了重大修正。

与19世纪50年代初期把英国对印度的破坏行为称为一场“社会革命”相反，马克思晚年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看法。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公社制度的破坏，将很快在东方社会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场战争无疑将使东方社会进入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

由此，马克思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作为唯一的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欧洲去。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首次提出了东方社会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这方面的思想。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驳了民粹派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强加于他的一种观点。马克思认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① 马克思同时指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它的最大长处在于是“超历史的”。由此，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就不能生搬硬套到东方社会去。

1881年2—3月间，马克思写的致查苏利奇的信及信的草稿集中阐述了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及其现实条件问题。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②。

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村公社有两种发展的可能性，一种是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种是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使公社解体。但在西欧资本主义扩张的情况下，一切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经营方式都将被暴力手段所破坏。马克思考察俄国公社的存留问题是同俄国所处的世界环境，即欧洲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对它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他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③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用暴力手段从外部破坏农业公社的行为表示气愤，在谈到印度公社被破坏时，他义愤地说：“谁都知道，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④ 因为，马克思本来设想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可以在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基础上实现直接跨越，但现在这种土地公有制被资本主义的野蛮行为破坏了，马克思认为这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那么，如何可以使当地人民前进呢？马克思指出，在和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2页。

② 同上书，第7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44页。

④ 同上书，第448页。

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农业公社，只有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才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推动历史前进。既然农业公社既可能由于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而解体，也可能在受外部侵略的条件下被消灭，那么这种农业公社要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就必须有两个条件，即马克思和恩格斯讲的以下两点：第一，在“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的世界上，现存的农业公社只有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灾难性波折，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第二，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①

马克思在晚年谈到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农奴制公社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时，认为不发达国家工业化道路应有特殊的规律，不能将西方工业化的模式完全地照搬过来。恩格斯晚年不排除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具有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通过生产力移植的方式，东方社会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工业化。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东方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工业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范围内的现实背景下提出的，可以直接吸收西方工业化的成果而不必重蹈覆辙。马克思1881年在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经济形态的改造问题时指出：“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和它同时并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②恩格斯在1893年也说过：“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灾难。”^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之所以能够作出这种估计，是因为看到了俄国土地村社所有制和劳动组合的习惯赋予它们以集体占有和合作劳动的自然基础，而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又给予它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物质条件，不过，为了实现这种可能，“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8页。

④ 同上书，第441页。

（六）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①，“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成果，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②。

二 关于亚洲工业化的想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历史进程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③ 另一方面也辩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或积极影响。“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驱逐她的凯旋车。”^④ 但是“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⑤。尽管西方殖民者在殖民地实行的一切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当地人民群众的现实，但是也应该承认西方殖民者带来的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文明理念，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贸易扩张和殖民主义打破了落后地区原有的田园诗般的封闭的宁静，冲破了其僵化的社会结构，客观上在这些地区为西方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不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的必要性

恩格斯在致弗·阿·佐尔格的信中指出，中国必须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4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页。

（二）西方工业化对亚洲古老文明的破坏

虽然亚洲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固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中经过无数的政治风暴而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但是在比之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却不堪一击。马克思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他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②

尽管马克思也有中心—外围的思想，但马克思不是“西方中心主义”学说的支持者。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③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一个体系或系统，是有中心的，且中心是不断转移的。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来看，最初中心是英国，代替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中心的将是美国。对此，恩格斯曾有远见地指出：“当英国迅速丧失它在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的时候，法国和德国正在接近英国的工业水平，而美国正要不单在工业品方面，而且在农产品方面把它们统统赶出世界市场。美国实行一种至少是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无疑会彻底摧毁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同时会破坏德国和法国的工业品出口贸易。”^④应该说，世界历史是利益关系调整的历史。

由于资产阶级使东方依附于西方，因而形成了资产阶级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的“中心—外围”关系。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即“处于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⑤，被资本主义“强力”纳入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与国家“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中心”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卫星”国的畸形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指出：“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盈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6页。

② 同上书，第7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④ 同上书，第7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5页。

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① 在晚年笔记中，马克思根据新的历史材料，结合许多民族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思想，使“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必然趋势，更加从原理的层次深入具体的历史之中。

（三）西方工业化对亚洲古老文明的重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过程中所造成的灾难有清醒的认识，并对资本主义在落后社会的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揭露，认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性的活动是彻底推翻一切民族中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民族间完全平等的关系。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段精彩的论述：“……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可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②

马克思总结道，人类之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③。而这个转变不是由神或人的意识决定的，而是由物质事实决定的，是一种客观历史规律和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

③ 同上书，第540—541页。

‘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① 马克思曾指出：“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②

马克思在 1853 年关于印度的一组论文中指出，印度传统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且正在归于消灭，正是英国的蒸汽机和自由贸易造成的结果，因为后者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③。

对于东方最大的古老的中华民族，马克思同样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侵入，为它提供了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将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走向瓦解。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和战争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和带来的深远影响时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④；“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 1840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⑤。

对于中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走上西方式发展道路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0 年做了相当乐观的预言：“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被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带到了一场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结果的社会变革的前夕。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41 页。

② 同上书，第 56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65 页。

④ 同上书，第 691 页。

⑤ 同上书，第 692 页。

着：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看作一个历史进步体系，它将会通过殖民主义、自由贸易等途径从先进国家移植到落后国家，并且是通过一个持续的对前资本主义结构的破坏和替代过程向落后国家传播。”^② 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抨击，“主要是基于其停滞的本性，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历史进程的障碍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严重威胁”^③。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后继者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自马克思、恩格斯讨论工业化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也根据国情的需要，展开了对工业化在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必要性和发展路径的讨论。

一 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面临的第一大问题是如何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物质基础之上的，但是苏联却并非如此，而是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国家基础上建立的，因而要巩固社会主义政权，首先要建立大工业社会，才能在物质上战胜资本主义国家。为此，列宁基于当时苏联的现实，将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进行创新，提出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工业化的思想。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个一般的原理上。必须把它具体化。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④ 列宁指出：“开发资源、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的和唯一的基础只有一个，这就是大工业。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278页。

② Gabriel Palma,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A Critical Overview*, Dudley Seers (ed.) *Dependency Theory A Critical Reassessment*. London,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Ltd., 1981. p. 21.

③ *Ibid.*, p. 24.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页。

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更是如此。”^①

（一）列宁的工业化理论

列宁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的继承者、发展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思想的实践者。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②

1. 关于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立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基本逻辑。十月革命之后，基于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客观形势，列宁以巨大的勇气回答了革命继续前进提出的迫切问题。当时国内的苏汉诺夫等人 and 国外的第二国际的首领们还在那里把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看作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的不可逾越的途径，并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理由，反对十月革命，否定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列宁批评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列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自己：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吗？”并反诘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来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③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逐渐意识到跨越发展并不能等同于跳跃发展，在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跨越发展过程中还需要有一个反映跨越发展要求的“中间环节”。他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④正是基于对跨越发展内涵认识的深化，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理论。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1—3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

③ 同上书，第777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页。

2. 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思想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从国际竞争的角度阐明俄国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写道，革命在几个月内就使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但是这还不够，“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①。要做到这一点，俄国就必须走向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将这个思想发展为苏维埃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理论。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完成工业化的主要路径。1893年，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中通过考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条件下的扩大再生产，得出如下结论：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快；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列宁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来说，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技术愈发展，人的手工劳动就愈受排挤而为许多愈来愈复杂的机器所代替，就是说，机器和制造机器的必需品在国家全部生产中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重要。”^②这一理论后来成为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理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3. 关于利用市场、利用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思想

以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列宁发现在传统经济而不是大工业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不能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说：“试问能不能由这种在俄国占优势的状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呢？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须有一个条件，现在我们有了一部业已完成的科学巨著，知道这个条件是什么。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如果我们能建立起几十座区域电站，如果我们能把电力从这些电站送到每个村子，如果我们能得到足够数量的电动机及其他机器，那么从宗法制度到社会主义就不需要或者几乎不需要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了。我们很清楚，实现这‘一个’条件，单是完成第一批工程，就至少要花上十年工夫，至于缩短这一期限，那只有等到无产阶级革命在英、德、美这些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时候才有可能。”^③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9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利用市场来促使工业化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一个政党如果“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说它在干蠢事，是因为这种政策在经济上行不通；说它在自杀，是因为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必然遭到失败”。^①而且认为：“要继续前进并学会欧美科学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头等的最主要的任务。”

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明确提出了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起来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思想。列宁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②正是这种关系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同俄国发生经济往来。同时，“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③。建立这种联系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为不仅俄国依存于世界，而且世界经济的恢复也需要俄国。“我们强调世界经济的意义，并且是有意这样做的。这无疑是正确的观点。要恢复世界经济，就必须利用俄国的原料。不利用俄国原料就不行，这样说在经济上是正确的。”^④列宁提出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他说，“俄国要实现电气化就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因此“提出把国际经济同电气化计划联系起来在科学上是正确的”^⑤。

应该说，列宁依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科学方法论，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条件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关系所进行的新的探索，是对马克思建构的全球化思想做了重要发展。

不过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即使列宁想利用世界市场来为新成立的苏维埃政权服务也很难。当时苏联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包围之中，不可能借用世界市场发展本国的工业化，也因此，利用世界市场服务苏联的想法基本落空，这也是后来斯大林极力建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由。

（二）斯大林工业化理论

作为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苏联的主流理论和指导思想，斯大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4页。

⑤ 同上。

林的工业化理论不仅对苏联，也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主要涉及大工业发展的战略、发展机制和积累来源等几个方面的内容。^①

1. 关于工业化战略

斯大林认为应该改变传统的发展思路，发展重工业。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通常都是从轻工业开始。由于轻工业同重工业比较起来，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也较容易，所以在那里，轻工业成了工业化的头一个对象。只有经过一个长时期，轻工业积累了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于银行，这才轮到重工业，积累才开始逐渐转到重工业中去，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但这是一个需要数十年之久的长期过程，在这时期内只得等待轻工业发展并在没有重工业的情形下勉强凑合着。共产党当然不能走这条路。党知道战争日益临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所以必须赶快着手发展重工业，如果这件事做迟了，那就要失败。”^② “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算做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否则就谈不到保证我国在经济上的独立。”^③

2. 赶超理论

为使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必须实施赶超战略，为此，国家应动员一切力量，加紧完成工业化任务。为高速度发展工业，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提出：“高速度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和关键。”“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但是这样做会使我们的一切计划（无论预算内的或预算外的）都很紧。……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出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计划很紧。”“除了外部条件以外，还有迫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脑即我国工业要高速度发展的内部条件。我指的是我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我指的是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

① 沈宗武：《斯大林模式重评——必要性、方法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第59—64页。梁孝：《斯大林模式、工业化和边缘国家的社会主义》，《管理学刊》2012年第2期，第40—44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2—113页。

还占绝对优势……”列宁关于这一点是这样说的：“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列宁就是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电气化，即‘把国家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或者回到资本主义去。……可是，不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首先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把全国经济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是不可能的。迫使我们高速度发展工业的内部条件就是如此。”^①

3. 建立计划经济体制

为适应上述工业化战略，斯大林认为应建立高度集中的以单一公有制和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斯大林提出：在私有制的小农基础上是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在1925年斯大林提出工业化路线和192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苏联已经解决了城市中的所有制问题，只是农村还是个体经济的天下，因此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建立单一公有制的运动。

由于苏联是一个农业国，斯大林把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作为积累工业资金的手段，并提出：“农民不仅向国家缴纳一般的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而且他们在购买工业品时还要因为价格较高而多付一些钱，这是第一；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多少要少得一些钱。这是第二。”“这是为了发展全国（包括农民在内）服务的工业而向农民征收的一种额外税。这是一种类似贡税的东西，是一种类似超额税的东西；为了保持并加快工业发展的现有速度，保证工业满足全国的需要，继续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然后完全取消这种额外税，消除城乡间的剪刀差，我们不得不暂时征收这种税。”^②

关于计划管理，斯大林在1927年召开的联共十五大上明确提出：“固然，它们（指资本主义国家——本书作者注）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③

①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6—84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9—140页。

③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页。

当然，为加快积累工业化资金，斯大林采取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的征购和“剪刀差”办法。^①而这种办法的长期推行却激化了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

当然，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工农业“剪刀差”的做法在当时是有争议的。作为苏联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著名理论家，布哈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实现工业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布哈林反对普列奥普拉任斯基提出的以工农产品“剪刀差”来剥夺农民剩余的办法，认为这是“建议无产阶级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同时也不同意利用市场来发展工业化，认为苏联当时受帝国主义包围和面临战争的威胁，利用市场机制均衡发展的工业化模式和政策，也并不能解决快速发展重工业以保证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而是推行国家工业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像资本主义工业化那样，把农村当作“殖民地”，掠夺农村来加速工业化，而是“对农业进行巨大改造和使农业得到极大增长的手段。因此，国家工业化也意味着农业工业化，这样它就为城乡对立的消灭做了准备”^②。

二 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工业化实践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为此，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考虑中国工业化问题，以确保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

（一）早期的认识

1. 关于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

1944年4月，毛泽东即强调“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③。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的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负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④。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39—140页。

② 《布哈林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6页。

④ 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解放日报》1944年5月26日。

2. 关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

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① 并且，中国也不可能采用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一方面，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道路在西方行得通，在中国却行不通；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尽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速度有时也可能是比较快的。但这是一条使少数人富裕、大部分人贫穷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道路，是一条以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起点，以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特别是广大农民的利益为前提的道路，是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疯狂侵略和掠夺而发展起来的道路。

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②

新中国成立后，加速工业化，实现国家富强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由于苏联的示范效应，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被认为是成功的。经过3年国民经济恢复，以1953年“一五”计划的实施为标志，中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实现之前景必须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实现中国工业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最佳选择。既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就应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有本质之别，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可以是一个社会集团财富和地位的崛起伴随另一个更大的社会集团的生存资料的失落，而中国要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不仅要使社会财富得到大量的快速的增加，还要使广大劳动者成为社会财富的享用者，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集团对多数人集团劳动无偿占有的局面。^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页。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③ 参见樊瑞平、车美平《毛泽东对马列工业化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年第6期，第8—12页。

3. 关于实现工业化的手段

毛泽东先是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后将其明确改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①并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含义作了明确的解释，强调“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特点之一，从而使中国工业化路线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社会主义的方向。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建设中，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工业化不能排斥市场的作用。1956年年底，毛泽东提出过他的“新经济政策”构想，明确表示要允许国家市场的对立物自由市场的存在；允许国营企业的对立物地下工厂的存在；允许私营工厂的出现，允许华侨投资办厂等；认为“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②。同样，刘少奇也曾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些资本主义或小生产者，有什么不好呢？这对人民有利”；资本家可以盖厂、开私人工厂，“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并不可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③周恩来也说：“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有都可以开。”“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用这个办法。”“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以让他办下去。大概工农兵学商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④

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并非无曲折。1956—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学习和借鉴苏联经验，试图通过计划经济快速完成赶英超美的任务，同时也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同上。

③ 《共和国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同上。

在摸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使其不完全同于苏联模式。如在工业化发展速度方面，提出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针对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弊端，强调农、轻、重协调发展；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特点，提出大中小企业并举、城市和乡村工业共同发展。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基本没有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大框架，因此也就没有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二）改革开放之后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续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市场与工业化之间内在联系的思想，突破当时计划经济的思想束缚，借助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适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大战略。

针对计划经济的弊端并鉴于中国国内市场狭小的状况，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开始借助国际市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把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1985年，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多年的实践证明，“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①。1997年党的十五大更明确把工业化和市场化融为一体，提出：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②。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③。

中国需要加强与世界的互动。邓小平“以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考察中国的发展问题。“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④“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14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8—20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①“从世界的角度”出发，邓小平透彻地分析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理论。而闭关锁国、自我封闭是我国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教训。邓小平多次讲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②“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同样十分深刻。“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④“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⑤

如何对外开放？邓小平指出：“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⑥闭关自守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因此，“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⑦。邓小平说：“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⑧邓小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⑨

以后中国积极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在短时期内迅速完成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目前正在向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过渡。新一代领导集体正在进一步深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64页。

③ 同上书，第90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78页。

⑥ 同上书，第117页。

⑦ 同上书，第202页。

⑧ 同上书，第306页。

⑨ 同上书，第373页。

改革，推动中国工业化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性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①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第三节 当代学者关于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理论

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发展之后，拥有古老文明的亚洲却沉落到历史的低点。除日本之外，亚洲国家普遍以贫穷、落后的面貌“著称于世”。改变上述面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梦想，也鼓励更多的学者致力于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探索。^②

20世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苏联和中国改革开放前采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发展战略；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国家所采用的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三是亚洲国家或地区采取的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前两种工业化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摆脱世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控制，使国内经济和国内市场同世界市场脱钩、切断联系，试图建设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后一种工业化思路则相反，即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机会，加快工业化进程。

① 《人民日报》，2000年10月12日。

② 本部分写作参考了[美]保罗·伯克特、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关于最近东亚工业化的另一种视野：一种批评性概论》，《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2000年第2期；[日]平川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现代世界经济》，朱根译，荣项安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3期，第16—20页；李建华、王颖《国内外工业化理论研究观点综述》，《经济纵横》2004年第11期，第62—64页；迈耶·西尔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任保平、洪银兴《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理论述评》，《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第43—45页；宋小芬《国内外工业化理论综述——兼论工业化的一般性与多样性》，《经济问题探索》2008年第4期，第1—4页；王均奇、施国庆《工业化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综述及存在的问题》，《生产力研究》2007年第14期，第146—148页；王敏正《国内外工业化理论：回顾与评价》，《经济问题探索》2007年第11期，第2—4页。

一 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实践的关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何发展的问题一直为一些学者所关注，相应的一些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也相继诞生。这里分为三个部分，主要论述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西方学者提出的诸多有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拉美学者理论以及重点讨论亚洲国家工业化的理论。

（一）西方学者看待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西方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工业国发展历程为参照系，并未顾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特殊性，结果因其理论的不适用性而难以有市场，或实践证明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早期发展经济学曾广泛应用划分不同发展阶段的方法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在它们的发展阶段中，基本都包括工业化之后的阶段，这一阶段工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比较著名的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阶段理论，其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有钱纳里的三阶段论以及贝尔的三阶段论。

1. 罗斯托的五个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罗斯托根据经济史的一些事实，在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阶段》^①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理论。他认为，任何社会都能以其经济发展水平归入下列五种情况之一，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条件、起飞、成熟社会和高消费社会。而他在1971年出版的《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又增加了第六阶段：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不过，常常被人们提起的主要是前五个阶段。

罗斯托的理论贡献是首次提出并确定了经济的增长阶段，特别是其中的“起飞”阶段受到广泛的关注。他认为，主导产业不同是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技术基础，主导产业的出现主要是需求结构变化的结果。然而，从其高消费阶段特征来看，就业的高度“白领化”已包含了结构的变化，因为“白领”的就业更多地在服务业，工业在这一阶段的重要性显然已在下降。

^① [美] W. W. 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郭熙保、王茂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钱纳里的产业结构变化三阶段论

钱纳里在1960年发表的《产业工业化路径》一文，用计量经济方法研究了各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致性问题^①，此后又发表论文及专著充分论述其“标准产业结构”模型。钱纳里提出了产业结构变化的三阶段动态发展模型，即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②

钱纳里认为世界各国的生产技术具有相似性，各国国内需求和面临的国际市场也具有相似性，这样看来，世界各国的技术、组织形式、资本积累方式和偏好应该是相同的，因此它们的结构变化也应该一致。由此，根据统计分析，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资源禀赋和贸易结构等条件差异后，他得出结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变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结构变化就是“标准产业结构”。在标准产业结构中，初级产品阶段与工业化阶段之间的分界是制造业对人均GNP的增长贡献首次超过农业，大致发生在人均400美元（1970年价格）时；工业化阶段与发达经济阶段的分界是社会基础设施对人均GNP增长的贡献超过制造业，大致发生在人均4000美元时。其中，制造业的贡献率变化最大，在工业化初期上升很快，到达峰值后也很快下降。

3. 贝尔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论

贝尔在1974年出版的《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此后的30—50年将会看到书中所说的“后工业化社会”的出现^③。他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他认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大致可分为农业、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四种产业，后工业社会中的经济形态将会从产品经济转化为服务经济，它主要表现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劳动力将不会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贝尔还列出了各阶段相应的人均收入：前工业化社会人均收入50—200美元；早期工业化人均收入200—600美元；工业化人均收入600—1500美元；发达工业化人均收入1500—4000美元；后工业化社会人均收入4000—20000美元。

^① Chenery and Hollis Burnley: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ept., 1960.

^② 参见[美]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99页。

^③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高钰等译，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说阶段论的作者只是给出了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所要经历的一些必然过程，那么关于如何经历这些过程，西方学者则提出了各种假说，不过这些假说的共同点是建立在西方世界体系基础之上来讨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的，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说的学者们首先将世界划分为中心（发达国家）和外围（发展中国家）两个部分。

莫里斯·多布于1951年在将世界资本主义分为发达与不发达两个部分之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模仿工业化国家（包括技术和社会制度的模仿），加快工业化进程是经济独立和发展的关键。

保罗·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不同于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资本主义发展状态，它们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走过的道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其不发达的根源在于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经历一场社会革命之后，才可能有计划地利用经济剩余，真正形成有利于它们经济增长的社会制度。

韦伯认为，只有欧洲人才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①的受益者，欠发达地区没有这种理性精神而不能发展资本主义，只有培养这种资本主义的人文意识，才能推动它们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并断言欠发达地区单靠自身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罗斯托遵循同样的理论思路，用所谓欧洲特有的科学精神来解释“现代经济的起源”。

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问题上，亨廷顿极力主张要遵循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他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始于传统阶段而终于现代阶段。这样就可以根据一个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已经走了多远来对其进行比较和确定它的发展水平。虽然在这个过程中的领导权以及具体的现代化模式在不同的社会中是不同的，但所有的社会都会经历相同的基本阶段。”^②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家看来，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原因在于其社会缺乏“内在变迁”动力。这种现代化的原动力包括“科学革命（现代科学与技术）、市民革命（民主政治）、产业革命（现代产业和资本

① [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05—206页。

主义)。因此,后发展国的现代化必须首先输入这种原动力,否则,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产生”^①。

沃勒斯坦在其主要著作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②中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会自然生发出世界体系的核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不同层次,当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供给超过有效需求时,世界经济就进入停滞的时期。这时核心国家减弱了它对边陲、半边陲国家的控制和剥夺,从而使这些国家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发展而实现地位的变迁。但是,在世界体系中,核心、半边陲和边陲国家的结构在一定时期内是静态的,居于支配地位的核心国家只是少数,有一些国家处于半边陲的地位,而许多国家只能处于边陲的地位。世界体系理论过分地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对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结构的依赖性,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和具有的后发优势。该理论实质上仍是一种“依附”论的再现。

德国弗勒贝尔等人的“新国际分工”论。该理论依据世界体系论,认为第三世界工业化是发达国家为降低成本,而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欠发达地区,如建立“出口加工区”就是典型表现。这类工业化出现的背景有:一是劳动力成本在各国间不同且劳动力具有不可流动性;二是科技使得现代工业产生了可分离性,即产品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必高度统一;三是运输、通信技术的日渐发展使得资源配置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当然,以上理论连同依附论基本上是从外因来说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的兴起和发展的。

尽管在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上,依附理论具有批判性和一定的创建性,但是由于它过多地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性,而忽视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看不到发展中国家的优势,看不到世界普遍交往对发展中国家赶上和超越发达国家的积极意义,因而该理论等于是从一种困境陷入了另一种困境,是一种走向封闭的“独立”发展观。实践证明,该理论并未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任务的完成产生较大的现实意义。有的西方学者明智地指出了西方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错误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曾这样批评过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即发展

① 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15—316页。

②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庞卓恒、孙立田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中国作为一个集团脱离于发达国家，并且处于不利地位：“……发展需要通过政府实行广泛计划化，以促进大规模的平衡增长和大推进。”（迈耶，1988）他进一步认为，一些经济学家坚持错误的双经济学思路的结果，主要缺陷在于把世界上广大地区通称为发展中国家过于笼统，因此将经济学的不同主体应用于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可行的。

针对如何看待第三世界工业化和欧洲工业化进程之间关系的问题，居纳松（1986年）^①认为：“在现实发展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并不存在什么奇迹，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存在阻碍不发达国家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到来是毫无准备的”。一般说来，目前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解释可以分为两种主要倾向。一种认为工业化的起因应该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去寻找。改变资本集中积累的一些必要条件使投资有可能转向发展中国家，这些新的条件包括各种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方式、资本的国际化以及资本集中积累利润率的下降。另一种认为，变化的原因可以从资本主义经济外围本身去寻找。如殖民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政治独立、国家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经济政策的变化，这些因素都被当作解释提了出来。作者认为，变化的主要原因应该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结构中寻找。在大多数情况下，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结合才使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工业化比较方面的错误认识，有的认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不能和19世纪工业化进行比较；另一种认为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和处于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的19世纪欧洲工业化一模一样的复制品，这种说法也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历史本身并不会机械地重复”。作者认为，尽管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两者做历史性的比较既有用，又是十分必要的。

（二）拉美派学者关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问题

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反，以多斯桑托斯、弗兰克以及阿明等为代表的依附论者认为，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分工是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掠夺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基本方式。

^① [瑞典] C. 居纳松：《发展理论的危机与第三世界工业化》，《现代亚洲杂志》（英国）1985年第2期，第41—43页。

1. 新依附结构理论

针对拉美国家欠发达现象，以多斯桑托斯为代表的拉美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新依附结构理论。按照多斯桑托斯的经典定义：依附是指某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影响。当有些国家（主导国）能够扩展和自我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只是这种经济扩展的被动反映，这时两种或两种以上经济形式之间以及这些国家和世界贸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就采取了依附的形式。^①他认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不能仅仅从外部去寻找原因，只有对以当代国际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内部经济结构进行探讨，才能彻底说明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的原因。依附论把世界划分为“中心”（发达）和“外围”（欠发达）两个部分，构成国际经济关系的两个组成部分，认为外围地区的欠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是直接相关的，“依附链条”的存在使外围地区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地区，因此存在欠发达国家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②。拉美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必须改造这个体系”^③；当然，新依附结构理论也重视依附对发展的积极意义，依附也能够带来发展，即所谓“依附性发展”^④。多斯桑托斯从社会制度层面来揭示摆脱依附发展的对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向法西斯发展的强权政府，要么是朝社会主义发展的人民革命政府。在矛盾的现实当中，中间道路的解决方法已经表明是行不通的。只是空想而已”^⑤。

赵光瑞^⑥在上述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制度依附的概念，认为传统依附主要是生产力要素的依附，制度依附是一种新的依附形

①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② 参见[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载[美]查尔斯·K. 威尔伯主编《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许明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8—149页。

③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9页。

④ [巴西]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单楚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1页。

⑤ [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⑥ 赵光瑞：《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依附——对当今国际经济关系的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第84—89页。

式或依附发展的新阶段。制度依附始于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的非自愿服从，至今经历了生产方式依附、国际制度依附、国内政策顺从及区域制度一体化阶段，逐渐从局部的制度依附走向全面的制度依附。制度依附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以及资本的支配，同时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需求和执政理念的依附密切相关。拉美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结果的差异，说明了正确处理制度依附与自主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2. 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不平等交换理论有几个基本论点：资本可以在国际自由流动，劳动则不能；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导致利润率的国际平均化；由于劳动不能自由流动，因此工资是独立的变量，导致了工资的国际性差异；进入国际交换的商品具有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民工资的差异更甚于劳动生产力的差异。

3. 卡多佐的依附发展理论

卡多佐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具有依附的性质，同时也具有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依附的发展。尽管发展中国家在依附之下的经济发展会遭受一定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同以前没有外国投资时的损失要小得多。这个过程最终会导致落后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重大的变革，因而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由依附走向独立的一个过渡环节。

4. 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

边缘资本主义理论是阿明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的。他认为，“边缘资本主义”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一种封建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边缘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殖民主义阶段、进口替代工业阶段、自力更生阶段。在世界资本主义条件下，边缘地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是以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为前提的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走上第三个发展阶段，才能改变中心控制边缘、边缘依附于中心的状况。阿明指出：“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它们的抉择事实是这样的：或者是依附发展，或者是自主中心发展，这在形式上必定是创新的，有别于当前的发达国家。在这里，文明的不平衡发展规律再次出现：外围国家不能仅仅赶上资本主义国家模式，它必须超过它。”^①

① [法]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29页。

拉美学派看到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因而提出“独立自主”的发展理论。但是该理论没有从世界普遍联系的观点出发，孤立地认为依靠自我发展才能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这与西方学者的看法正好相反，忽视了外部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有用之处，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机会来实现经济增长。也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拉美学派最终也没有帮助拉美国家或类似的国家走出发展的困境。

（三）关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理论

亚洲国家工业化的大体成功为世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篇章，也因此，东西方学者均对亚洲经济增长进行了“事后”评论，包括世界银行对亚洲发展经验的总结。^①基本的观点认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是利用国际市场提供的需求和产业转移的结果，也是国家对外开放和干预经济的结果，特别是在利用世界市场方面，亚洲国家是很成功的。“在当代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地区中，至今未发现与世界市场经济相违背而实现工业化的先例。这是在历史地分析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发展模式时首先要确认的事实。”^②

1. 雁行理论

雁行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在日本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一步步实现工业的升级换代。这种雁行图式的工业化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进口—国内生产—出口；其次是从原始的简单的产品转向复杂的加工产品；最后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一条直线。当今的雁行理论认为日本资本是东亚经济的领头雁。雁行理论不仅仅涉及一个国家，当先行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开始大规模投资时，雁行理论就成为一种地区工业化的理论。

2. 依赖理论

该理论驳斥了雁行理论对日本的赞扬，认为日本工业的结构性区域体系等级森严，日本和外围企业之间附加值的分配极不公平，其结果是东盟三国在市场、技术和资金上对日本形成极大依赖。东盟三国出口导向型工

^①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日]平川均：《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现代世界经济》，朱根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6年第3期，第16—20页。

业发展不是内部国家工业化的结果，而是对日本投资的结果。东盟三国易陷于不断增长的结构性贸易赤字中，阻碍了东亚继续发展，包括对资本流入形成的持续性依赖和不得不接受国际市场对出口制造业中的妇女和儿童劳动力进行的超级剥削和掠夺国家的自然资源基础（如森林、矿藏、渔业、农业用地等）。

3. 渡边利夫的后发性利益假说是对格申克龙的后发达工业化的积极解释

与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不同，格申克龙是从另一角度提出发展阶段论的。他将地区的发展分为发达地区、中间（中等发达）地区和后进地区三个工业化阶段，注重各个阶段不同的资本供给结构。强调第一阶段是企业；第二阶段是银行与企业；第三阶段则是国家、银行和企业，分别成为推进主体而实现工业化的。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家是作为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制度而出现的。阿姆斯特丹沿用这一观点，解释了韩国的工业化。他在重视工业化技术分析的同时，区分了不同世纪的工业化方式，指出英国是通过发明；德国和美国是通过革新；而当代日本和韩国则是通过引进技术和学习消化而实现工业化的。在工业化的各个阶段，国家的作用依次从自由放任转向保护弱小产业，进而形成扶植体制。与新古典派模式不同，正是通过制定政策倾斜的价格体制，使韩国获得出口的竞争力，最终实现工业化。受格申克龙和赫希曼等人的阶段论影响，金泳镐也将韩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看作第四代工业化类型。认为工业化的推进主体，第一代是私营企业；第二代是银行与私营企业；第三代是国家和私营大企业；第四代是国家、外资和私营大企业。而在担负第四代工业化的三者中，国家和外资（跨国公司）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们一致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外部因素不可缺少，同时国家的作用颇为显著。

4. 大中华理论

该理论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尤其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的华人企业作为亚洲经济进步的主要组织者和稳定器。但大中华论者通常含有大量的、过时的小商业观念，强调家庭企业的活力，低估了日本资本的力量，同时认为中国内部的矛盾和不稳定是这个地区繁荣的潜在威胁，有可能与日本和美国产生贸易和外交冲突，当然，真正危险的冲突升级被认为是不可可能的。

5. 国家主义（干预）的手段

该理论试图用外部原因说明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增长的依附理论失败后，研究的重点集中于国家主体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与此同时，在判断新古典派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正确与否的时候，就更加突出了对国家作用的研究。争论的焦点从“依附还是自立”，发展到“国家还是市场”，也就是转移到国家对经济增长是否起到根本作用问题上。

实际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如同不得不使新古典派逐步承认国家所起的一定作用那样，政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韦德认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的增长是在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私营企业的合作与竞争体制共同发挥作用而实现的。在阿姆斯特丹看来，韩国正是因为有国家的价格倾斜而获得成功的。哈格德在认为出口主导型发展战略给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带来比较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研究了政策转换的经济、法律和制度条件。在这种非新古典派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研究背景中，不能忽视日本的产业政策经验。

新自由主义认为日本、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东盟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经济成就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鼓励当地企业利用较低单位的劳动成本从事劳动密集出口导向型产业。这种模式使企业能克服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当生产率的提高超过了实际工资的增长时，东亚国家就能获得产出和就业的快速增长，同时又不会威胁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和出口的竞争力。政府通过实行相对宽松的限制和对出口导向型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出口驱动模式。这种做法对上述东盟三国尤为重要，使它们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当然，新自由主义也看到了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低工资国家（主要是中国）的竞争对东亚经济技术增长的两个威胁。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同时，来自内部对增长的威胁主要是利益集团（如要求提高工作和办公场所的安全性、妇女经济平等、福利开支和环境保护）对经济稳定和竞争力的破坏。

制度主义认为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政府的作用，包括投资和出口补贴、新兴产业的保护、新兴产业活动战略计划的制订，等等，鼓励了受保护的幼稚工业成长为富有活力的、全球竞争性强的企业和部门。制度主义认为对东亚持续增长的最严重的威胁来自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它们都要求东亚国家经济自由化。许

多制度主义者也担心国内政治民主化将损害国家凝聚力和国家行动的独立性。他们赞同新自由主义控制工资成本和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观点。

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都有局限。一是在主要的市场受到限制和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情况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是否可行。制度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困扰东亚国家的生产过剩问题认识不足。在亚洲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和政府试图通过相对贬值维持需求的努力是这个地区经济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是两种分析方法都将工业化很大程度上视为一个工程和管理问题，认为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仅限于国家政策领域，这种技术化和非社会化地处理工业化和发展问题的方法使得国内公众的利益要求被限定在一个低水平上，如工资被抑制等。

新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认为东亚的发展模式可以照搬到其他国家，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日本工人工作时间、劳动强度、劳动力的灵活性和单位资本附加值水准是其他核心国家不可能接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日本政府集权式的管理抑制了劳工和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样，韩国也是如此，韩国资本积累得益于远高于国际标准甚至第三世界国家标准的长的劳动时间、高的剥削率和工业事故率。此外，“冷战”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出口导向型增长十分重要，这一点也不可能被移植或复制。

再有，两种分析方法均没有考虑到市场对生产的制约作用，是在世界市场无限扩张的前提下讨论东亚工业化进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私有企业为了提高剩余利润，而不考虑市场需求。东亚最终不得不面对市场缺口问题，这一点也是其他地区进行工业化需要注意的地方。

6. 调整派

“调整”本身是一种与新古典派的一般均衡理论相对抗的概念。这一学派反对将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理解为一种非概念的新潮事物，而将它视作“泰勒主义经济”的出现。调整派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亚洲国家工业化是跨国公司向边缘地区（外围发展中国家）强制转移部分产业生产的结果。工业化理论与新国际分工论所讲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理论极为相近，其新意就在于更加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主体性，更加显示出技

术高度产业化的可能性。因而，调整派对新国际分工论进行了严厉批判。奥米奈密认为，“关键在于跨国公司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史无前例的现象和原因”。换言之，“即出现了超国籍的，亦即世界范围或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该观点同国家主义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论殊途同归。

7. 替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美国学者保罗·伯克特和马丁·哈特—兰兹伯格认为，左翼不应该将公众的激情看作需要严格管理起来的破坏力量，不应支持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东亚危机表明这种发展战略是死路一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计划性确实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替代只有在超越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以工人团体为中心的经济体时才能最终促进人道的发展。群众的抵制已经阻止了在东亚完全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的紧缩政策。

二 对亚洲国家工业化的启示

总的来看，马克思之后的学者们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是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角度来探求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如不平等交换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路径，等等。也正因此，多数学者将发展中国家看作发达国家的依附品，或者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立起来。由于这些学说缺乏世界的视角，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大，在实践中更是遭到“重创”。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提升、工业化任务的完成以及和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来源却是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自身运动的结果，是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必然向世界拓展的结果。尽管学者们道出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的状态，却忽略了工业化本身运动变化规律在空间上表现为一个逐渐拓展延伸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可能没有发达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历史机遇，包括殖民地的消失、“免费”的原材料和市场的消失，等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却可以在与发达国家交往中获得机会，赢得经济发展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看似是对发达国家的“依附”，但是如果抓住机会，发展中国家仍可以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实现经济的跃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四小龙”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发展中国家借助发达国家的资本发展外向型出口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种机会。

工业化自诞生之日起似乎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设置任何限定发展的机会，但是如果各国自身将这一运动过程看作一种静态的、缺乏联系的过程，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看待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这一基本原理。

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造运动，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生态，同时也改变了国家间的关系。工业化在世界部分国家的率先产生和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在当时，资本主义的种种要素迎合了工业化的内在要求，也因此有部分国家很快建立起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是，工业化本身是不会止步不前的，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世界里，工业化更因为资本追求利润的特性而会以更加快的速度突破一国政治疆域，并向发展中国家拓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力更生和“依附”发达国家发展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两种选择。在发展中国家重复发达国家老路的历史条件已经丧失的前提下，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发展空间不失为一种快速发展的捷径。这也是为什么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转向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且转轨快的国家也率先实现了经济发展。

当然，发展中国家对工业化进程的“修正”需要做一个简要的说明。首先，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工业化任务，仍然必须遵从工业化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其次，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并不是对工业化内在规律的“修正”，而是尽可能满足工业化所需的基本条件。由于发展中国家国情不同，在满足工业化所需条件的过程中有的需要资金，有的需要市场，有的需要技术，有的需要资源，有的是综合需要，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也因此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画面来。再次，发达国家的“政治”附加条款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发达国家的机会方面是不平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的对立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选边”站，那些对发达国家具有重要作用的发展中国家率先赢得了发展机会。亚洲诸多国家当时被美国认为是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包括资金、市场等多方面的援助。最后，发展中国家“依附”发达国家启动工业化进程，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国内条件不重要，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土地改革、资本积累以及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也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快慢。因此我们看到，即使在已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运动的亚洲地区，国家间仍存在较大的发展差距。

对有关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的学说和理论做一些澄清，使得我们可

以纠正一些不妥的看法，回归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理论的本身，更好地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问题进行解读，也有利于升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认识，并予以进一步的理论延伸。